

出生于1942年的父亲,就像是“从前”而来。每次跟他在一起聊家常的时候,父亲准会热衷于跟我讲他从前的事,就像每次跨年后要写日期,总是习惯性写成上一年的日期一样,讲从前的日子,讲从前饥荒的年代,苦难的岁月,16岁那年就开始赚钱……讲多了,无非是想让我懂得珍惜生活,不要乱花钱等等。听多了,有时候便问父亲:“你愿意活在从前吗?”他摇头道:“那怎么活?那么苦的日子谁愿意过?”

等我做了母亲后,我的脑海里也开始诞生出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要求,把自己内心最美好的愿望都放在儿子身上。有时候看到他挑食,起床不叠被,不整理书桌,一个人窝在家里不爱出去串门……这个时候,我也像父亲一样,经常对着儿子讲我从前的事,讲我7岁的时候就会做家务,讲从前乡村的恬静,人情也暖,邻里会按季节彼此馈赠食物、桌上的鲜蔬全是来自菜圃里刚摘的,讲童年的单纯……儿子打断我,“你说的从前有那么好吗,那么从前的从前叫什么?”

网红脸当道天天上热搜的今天,我们怀念起了上世纪80年代的港台明星,影视明星占据流量的那些年,从前我们曾追过的那些金庸剧里的女主角,红极一时,长得本色又自然,那是我们那一代无数人心头的至爱。

电影《芳华》一上映就引来无数人的怀旧,那是一部讲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忆里的青春影像。可是在我看来,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多次到上海来过年,下榻在西郊宾馆。在吃的方面,小平同志不讲究,除了家乡苦瓜不离口外,最喜欢吃的,就是每年春节功德林特级厨师李承瑞老师傅烧的素斋了,其中素蟹粉几乎乱真,更是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青睐,每次餐后,大受赞扬。有一年春节,李承瑞师傅把他的几道拿手的素斋烧好后,照例是非常受欢迎。饭后,小平同志还特地关照时任市委招待处处长葛非,把李承瑞师傅请过来,当面谢谢他,还合影留念。

李承瑞师傅个子不高,非常乐观,整天乐呵呵的,像个小顽童。看到我们就爱开玩笑,天南海北,南腔北调,戏称厨师们都是“小把戏”,厨师叫他“小调皮”。他不论对谁都非常热情。那时候,我负责集团厨师培训考核工作,经常见到他。有一次,他看我对象素蟹粉称赞有加,就跟我讲:“小邱啊,我来教你做素蟹粉。”我有点畏缩,平时我在家又不烧菜,一点基本功没有,怎么可能学做这样高级复杂的菜呢?担心学不好,就连连摇头。他鼓励我说:“学起来,很便当!”接着就和我讲要准备的食材和烧的顺序,以及要注意的地方,一次次手把手教我。以后只要见到我,就会问我:“学会烧了吗?烧得怎么样?”还对我说:“吃一次素斋,就是一次修行,就是要做好人,做好事,要把心静下来。”

他这么热情,我当然也不能不去试啊。我按照他的要求,准备好胡萝卜、土豆、冬笋、黑木耳还有蛋清、调味品等辅料,在家里反复操练,几次下来,居然能烧出素蟹粉了,虽然味道不怎么地,有点滥竽充数,但是,乍一看,还真有点像模像样了。李师傅教过我:“在烧素蟹粉时,要掌握火候,铁锅要烧热后再放油,等到锅里冒烟了,素蟹粉就倒到锅里,快速、反复炒,马上盛上来,再放点醋,趁热吃。”我按照要求,细心认真,多试了几次,果然如此,美味无比。

我成家后,有一次过年,兴趣来了,破天荒地烧了素蟹粉,露了一手,家人都不相信是我烧的,吃了赞不绝口。趁着兴致,之后逢年过节,我还烧过几次。以后工作忙,就不烧了。现在退休在家,几次想下厨去烧,又退缩了。这次国庆假期家人聚餐,女儿点了素蟹粉,菜上桌了,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色香不行,更重要的是味道变了,没有一点蟹粉味。妻子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吃过你烧的素蟹粉,你是老师傅了,怎么不烧给我们吃?我倒是几次想烧,但又放弃了,没有当时的心境了,怕花时间长了又烧不好,又怕环境变了,家人的口味变了。关键是,没有名师的督促,我也没有烧的激情了。感觉再烧,也到不了那时的水平了。

李承瑞老人已经过世好多年了。我每次吃到素蟹粉,就会想到他,想到他说的话:“吃一次素斋,就是一次修行,就是要做好人,做好事,要把心静下来。”我一直记住这句话,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



那些主人公的命运却充满着残酷和伤痕。或是更早的那几年里,人们十余年的生活,始终险象环生,被阴云密布笼罩着,内心深处始终有着郁郁难舒的一部分,有的人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出现了割裂,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打乱,在那些不曾芳华的芳华岁月里,人们过着简单粗糙的日子。而在底层求生的劳苦大众,整日田地间劳作只为温饱三餐。

记得有人说过:“我觉得小时候不快乐,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好,我说就现在最好。”是的,人们总爱怀念从前,怀念从前的从前,怀念贫穷、怀念当时流行穿着用“元宝针”针法织成的毛线衣,怀念有一大串的姐弟,怀念小时候盼过年,耳朵、眼睛、嘴巴都会统统调动起来的那种心情……怀念是一针镇痛剂,怀旧是一种减压方式,但,只适合偶尔用一下,不能轻易上瘾。

我们总是会这样夸张:现在一定是糟糕的,过去一定是纯粹的。那么,从前的从前岂非更好?然而,从前的从前,只是因为我们将不好留给了遗忘,而从前的从前,甚至还不如从前好吧!

现在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聊过从前了。当我再次坐下与儿子聊天的时候,我们聊了各自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事。今天的每一天,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从前。

把每天的日子过得积极努力,给平淡的岁月增添些精彩,让未来的以前,更多一点货真价实的美好,而不要成为仅仅是带着滤镜的“从前”。

我小时候,母亲总是最晚一个走进睡觉的房间。每天晚上,待全家人洗漱完毕,老人和孩子都上床睡觉了,她便前前后后仔细检查一遍,看前门和后门有没有上好门闩,门厅和过道的桌凳是否已归整、靠边摆放,灶间的水缸里的水是否还足够做一顿早饭。若是水缸见底,就算是夜再深,天上下着雨,下着雪甚至“下铁”,她也会去河边挑水,并喊上我或妹妹,为她打手电。这样的巡查,成了母亲每晚的“必修课”。

我的老家是典型的江南枕水人家,房子前后分成四进,门厅进去是灶间,而后是房间和连着小河边的后屋。睡觉的房间是上下两层的小木楼,前后还隔着一个小天井。当时家里人口多,老人们住楼下,父母和孩子住在木楼上。我们上下楼梯,或在水地板上走动,脚下木板都会“吱吱”作响,母亲常常提醒、要求我们轻手轻脚,以免吵醒了早睡的老人。每天大清早,我爷爷就会摸黑去小镇上的茶馆“吃茶”,若是头天晚上没有将桌子凳子收拾好,经常会黑暗中磕了绊了身子,甚至摔倒。我奶奶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生火做饭,我们躺在床上,都能闻到从楼上木格子窗户外飘入的袅袅炊烟。同时,她还要为我们烧好洗脸的热水。那时候农村的生活用水,全依赖屋后的小河,早晨的河水相对清澈、洁净,父母亲会轮流着挑一对大木桶,去小河边挑水。一般来说,装满一大缸河水可管全家饮用两三天。若是当晚恰巧用干了,第二天大清早奶奶就必然得踮着她的小脚,沿着高低不平的石埠到河边提水,颤颤巍巍,十分危险。有一回,做民办教师的母亲去县里进修,走前没有查看水缸,也没有交代好家人,回家后得知奶奶去河边提水了,母亲别提有多自责。

尽管,这些都是生活中平凡、琐碎的小事,但正是于这样的细微处,体现了母亲为家庭、为老人所捧出的那颗沉甸甸的真挚爱心。这样的“必修课”,母亲坚持了许多年,直到把老人送走,孩子们一个个长大。

夜光杯

日前与几位复旦中文系1962级学生一起喝咖啡、聊闲天,他们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喜谈陈年往事,不知不觉间,就谈到了李庆云同志。

李庆云是从山东来的南下干部,1951年进入复旦,50年代中后期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是我的顶头上司;1978年受命组建复旦分校(后改组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是在座陈有生同学的上级,我们与他都有深度的接触。

李庆云做政治思想工作,自己并不研究文学、语言之类的专门业务,但对专业工作者却极其尊重。他很爱才,对于学有专长的教师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很爱惜,竭尽自己之力予以帮助。因为他为人随和,不摆领导架子,所以人们并不以官衔相呼,在复旦中文系做党总支副书记时,大家都叫他“老李”,后来到复旦分校做党委书记,因为年纪大了,大家尊称他为“大老李”,显得很亲切。

李庆云在复旦中文系当党总支书记那几年,正

是运动频仍的岁月,有些事他身不由己,但仍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加以缓冲。

施昌东是1951级的业务尖子,深受贾植芳先生的赏识,还在读三年级时,就在当时的名刊《文史哲》上发表美学论文。但也因此之故,1955年贾先生出事时受到牵连,被捉将进去。一年之后放了出来,暂挂在系里。对于被捉之事,他一直想不通,到得1957年春天,在当时氛围的推动下,就在物理系学生召开的鸣放会上放了起来。“反右”运动开始,就被反了进去,而且被认为是屡教不改,要发配到边疆去改造。李庆云觉得,施昌东业务好,能写文章,是个人才,就想了个办法,说中文系要经常出墙报,没有人做美术设计,施昌东能写美术字,能画图,就留在系资料室吧!这样,施昌东就留了下来。他在做资料、抄墙报之余,还读了很多书,写了许多文章。右派改正之后,出了好几本美学著作,成为国内知名美学家。

我做青年教师时,复旦教师的住房很紧张,也不像后来那样有明确的分配标准,能够有个预期。我结婚之后,没有房子住,也不知道何时能分配得到,无法可想。当时整幢仙舟馆(700号)都归中文系使用,而办公机构还不是很庞杂,所以房子比较充裕,老李就将楼下的一个房间借给我居住。那时蒋天枢先生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有一批线装书交给蒋先生保管,但他的家里放不下,也是老李帮忙,在系里借了一间房子给蒋天枢先生放书。不久,学校调整办公用房,中文系被压缩到仙舟馆楼上,楼下分

给经济系使用,这样,我和蒋先生都得搬家。蒋先生搬的是书,楼上教研室房间靠壁处还可存放,我搬的是家,却无处可以安顿。后勤组当然不会直接向我要房子,他们向老李要。听说老李对后勤组的人说:你们有本事,就把吴中杰的行李扔到马路上去,没本事,就分给他一间房子住。后勤组没有办法,只好在第六宿舍给我分了一间房子,总算让我把家安顿了下来。

但老李对我们的政治要求却很严格,发起火来还要训人。有一次,党委书记杨西光在登辉堂作政治报告,大家都在认真地记笔记,我却在笔记本下藏着一本业务书偷偷地看。这在当时是一种违犯纪律的行为,不知被什么人汇报了上去。回到系里,老李在全系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把我批判了一通。虽然当时我有点尴尬,但也深知老李是出于一番好意,想要培养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只是我

泻而下的水浪冲击得大幅度摇摆,犹如暴风骤雨般的瀑水及水珠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再好的雨披也无法抵御。快到马蹄瀑布时,水量和响声更大,溅起的浪花和水汽更高,洒得满身都是雾水。这时,你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铺天盖地,什么是气势磅礴。

上船后我虽十分注意抢占有利位置并保护相机镜头,但由于水汽和水珠的冲击,加上人多拥挤,没过多久镜头就沾上不少水,最后无法拍摄。我焦急中慌忙躲到驾驶室一侧,拿出手帕小心翼翼地捕捉镜头里水擦拭干净,然后抓紧时间捕捉美景。上岸后看看时间,来回正好一个小时。急忙打开相机回看,仅这一趟就拍摄了150多张照片,许多照片是在岸上根本无法拍摄到的。我无比高兴:值得!

雨后绣花说

都说城市管理要用绣花功夫,这里且说说雨后人行道积水的事。傍晚下班雨中步行回家,先是人行道上有几处积水,而地砖是不久前新铺的;接着是马路横道线上的一片积水,水泥路面也是近年新做的;再接着一处人行道与马路的接口,有个面积很大、水很深的水坑,汽车、电瓶车驶过,水花飞溅,令人避让不及,并且水坑几乎隔断了横道线,行人只得借步马路绕过水坑才能到达“对岸”。凡此种情况的不堪,坐在车里是体会不到的,只有亲身步行经过者才知晓。

于是我想:如果能建立人行道路长信息告知制度该多好!我的家乡绍兴农村早就有河长信息告示制度了,河边有个告示,上面有河长(即村长)的姓名和手机号码。人行道数量可比水乡的河道,如能有类似的路长信息告知方式,比如展示在路牌的下方等,就可以方便市民行人及时联系反映路况问题,而不至于绕大圈子或找不到反映渠道了。

当然,城市管理更多的绣花功夫还是要做在前头。比如铺好的人行道、浇好的水泥路是否平整符合要求,照理,都应该须经过质量验收的。

专业思想较重,一直偏重于业务学习,他调走之后不久,我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老李创办复旦分校后,邀我去兼过课,也叫我办过事。复旦中文系七七级语言专业毕业生祝敏申分配到分校教古代汉语,因为他对书法有研究,同时也开了一门书法研究课,还主编了一本《大学书法》教材,很受学生欢迎。李庆云自己不研究书法,但作为高校领导人,却很重视教材建设,在复旦中文系做党总支书记时,就大抓教材编写工作。他对我说:“小吴,小祝这本《大学书法》编得很好,你帮他联系一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可以扩大影响。你把这事办成了,我请你吃饺子。”小祝是我的学生,他的事我本来就该帮忙的,于是去找复旦大学出版社商谈,他们马上接受了。书出后,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老李很高兴,真叫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饺子。山东饺子,很好吃,名不虚传。

老李主持上海大学文学院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但政治风浪的余波还有。他们学校有一位教师写了本小说,因宣扬人道主义精神而受到批判。这事,很使老李为难。不批判吧,对上级难以交代,认真发动群众去批判吧,人道主义是个学术问题,应该可以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他对下面的干部说: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批判总是要批判一下的,但这种事,也不必搞得太严重。老李这态度很受到广大教师的好评,但也有些立功心切的人,却对老李很不满,甚至转而反对老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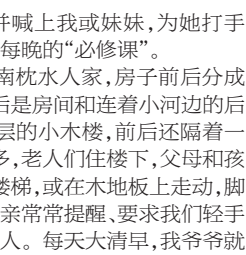
老李是在种种矛盾纠葛中退下来的。但他离休之后,来看他的人很多。我曾请他吃过两次饭,没有什么事,只是叙旧,但每次都被别人抢着付了饭钱。其中一次,付钱的朋友并没有同席吃饭,他远远看见老李,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转身过去顺手就把我们的饭钱付了。等吃完饭,我去结账时,收银员说,刚才那位已经代你们付过了。这虽然是件小事,但也可见老李群众关系之好。他们觉得,能请老李吃饭,是很开心之事。

七夕会

陈祖金

母亲的“必修课”

周建新



尼亚加拉瀑布是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游览观赏有多种方式,陆路、高空、水路、隧道等。根据笔者观察和亲身体验,最直接、最壮观、最惊心动魄、最耐人寻味的方式莫过于乘游船。那天,我们一行20余人从美国水牛城宾馆出发,在导游带领下,先在瀑布岸边走走看看拍些照片,然后再到河岸边的码头,等候乘“雾中少女”号游船。游船共两层,能载数百人。上船前,工作人员给每人发一件蓝色雨披。上船后大家争先恐后上顶层甲板两边,那里位置高、视线好,便于观赏与拍照。游船先经过美国两个瀑布,然后驶向加拿大马蹄瀑布。在游船上游客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瀑布狂泻直而产生的巨大水汽与浪花,只要船略靠近,便被直

水上拍瀑布

摄影

